

为什么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 王义桅



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价值、深远世界意义、强大实践伟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等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人类前途命运更具历史纵深的思考、对人类进步方向更具时代特征的指引，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深刻理解以上要素，才能更准确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丰富内涵。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各民族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用“自由人联合体”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共同体思想。

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描绘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超越工业经济时代人的异化而设想的概念。今天，工业经济依然存在，数字经济正在全面崛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描绘了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催生的思维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命运与共，主张“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

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中华文明中的“和合”观。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和而不同”理念拓展到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当口，是敌视对立还是相互尊重？是封闭脱钩还是开放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选择就在我们手中，责任就在我们肩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的鲜明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尊重国家主权，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目前，在全球治理中存在普遍

的先发优势、规则锁定、路径依赖等现象，现行国际秩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一面更加凸显。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吸引到世界上四分之三以上国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还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深信“世事变迁，和平发展始终是主旋律，合作共赢始终是硬道理”。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契合了时代发展潮流。《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指出：“人们普遍认识到，和平稳定、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依托，是解答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的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

合，尤其呼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心声；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共同安全理念，重视综合施策，坚持合作之道，寻求可持续安全，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智慧；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所有国家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不仅被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多次写进联合国有关的决议，被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称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全人类的福祉，既有现实思考，又有未来前瞻；既描绘了美好愿景，又提供了实践路径和行动方案；既关乎人类的前途，也攸关每一个体的命运。中国不仅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坚定实践者。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为各国共同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了世界人民追求和平、正义、进步的心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是人间正道，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情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游秦岭感怀

□ 韩伟

冬日雪后的秦岭，白雪能饱，银装素裹。远远望去，恰如银蛇飞舞；穿行其间，又恍若冰雪世界。或许，只有在雪后，这座横亘于祖国腹地、东西长达千余公里的大山，才显露出静谧、柔美的一面。真正地感受秦岭、理解秦岭，你就不能置身于外，而必须深入其中；你也不能仅仅踟蹰于秦岭脚下，而需要穿山越岭，来一场身体的接触、心灵的对话。作为陕西人，因着地利之便，我曾经多次攀登终南山、翠华山等秦岭的名山，也曾数次走进洋峪、祥峪等秦岭的峪口，但是，没有哪次秦岭之行，能超过这次雪后来岭南公园带给我的震撼。

岭南公园位于宝鸡凤县，高路秦岭之巅，处于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上。大雪过后，有着丰富植物资源的秦岭呈现出令人炫目的雾凇奇观，无论是柏树、松树，还是杨树、香樟树都挂满了冰霜。在冬日低温潮湿的环境下，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凝华在各色树木的枝头形成冰晶，再加上不时而降雪，秦岭山上一时玉树琼花、亿态万千。游人们纷纷在雾凇下摆好姿势拍照，孩子们兴致盎然地打雪仗，在覆盖着大雪的山坡上翻滚嬉戏。

岭南公园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嘉陵江源头。夏日的江源，水草丰美，千溪奔涌。现在是冬日，只能

看到一片茫茫白雪，覆盖了草木溪流的生机，但是我们似乎仍能感受到下面的江流脉动，那些涓涓细流造就了嘉陵江的磅礴，最终汇入更遥远的长江。

雪后的岭南公园带给人的震撼，并不仅仅是景观的奇绝，更因其丰厚的人文底蕴。今天的游人能够更加便捷地抵达秦岭腹地的岭南公园，得益于半个世纪前修建的一条铁路——连接宝鸡与成都的宝成铁路。

秦岭风景怡人，但它的崇山峻岭也是阻断南北人文、商贸交流的天然屏障。岭南公园所在的秦岭段以南就是汉中，再往南即进入四川北部的广元。从陕西到四川，因着秦岭的险峻地势，自古有“蜀道难”的诗句。的确，在依靠人力车马的年代，要翻越千沟万壑的秦岭，抵达温暖湿润的南方，被喻为“难于上青天”。秦汉以降，百姓们在千峰万仞中开凿出条条栈道，后来几经修缮，形成连通秦蜀两地的陈仓道、金牛道等，一直沿用千年。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曾计划修筑甘肃天水至成都的天成铁路，但由于天灾人祸、战争连绵，数十年后仍停留于设计阶段。

20世纪5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但为了开发大西北，建设一条连接西南与西北的铁路大动脉，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铁路施工技术

条件下，建设一条跨越秦岭的铁路殊为不易。前期勘测中，勘查队员克服重重困难，或翻越峻岭进行山地勘测，或乘坐皮筏子沿着嘉陵江进行线路勘查，时间长达8年之久。在科学勘测基础上，确定工程分段施工，除了成都的南段、宝鸡的北段，难度最大的就是中段，也就是秦岭这一段。1953年，宝成铁路工程中段在凤县双石铺动工。

秦岭山高林密，地质结构复杂，石英岩、花岗岩、板岩，硬度一个高过一个。要使铁路连接成线，就必须克服重重障碍，因此只能逢山凿洞、遇水搭桥，工程量巨大，工作异常艰辛。据统计，宝成铁路全线共有大小桥梁近千座，隧道300余条，桥梁和隧道长度接近线路总长度的六分之一。从杨家湾车站到秦岭车站，直线距离仅有6千米，但落差有600多米。为了满足在山地环境下铁路通行的要求，采取迂回螺旋的方式设计铁路线，形成著名的“观音山展线”，创造了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

宝成铁路的建设者们，为了开山架桥，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在天险灵官峡、在“观音山大台阶”等施工艰险路段，工人们汲取古人智慧，架起索道和吊桥，创造了铁路工程奇迹。工人们克服落后的施工设备带来的困难，凿洞劈山，埋头苦干，铸就了“不怕苦、

不服输、不含糊”的奋斗精神。宝成铁路的建成，彻底改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历史，被誉为中国人破解“蜀道之难”的里程碑。作家杜鹏程的名篇《夜走灵官峡》，记述的正是当年奋战在铁路线上工人们的动人事迹。多年后，他重游灵官峡，有感而发，再度写下诗句：“长桥飞渡连天堑，铁龙疾驰贯秦岭。筑路健儿今安在，青峰着意记英雄。”表达着对秦岭筑路英雄的尊崇与敬意。

返程之际，我们再次踏上这座名为“秦岭站”的铁路小站，在宝成铁路主题文化广场驻足流连，在小站对面的“宝成精神陈列馆”度散瞻睹，那些以车辆车轮和废旧钢轨为材料制作的雕塑，那些记录了宝成铁路建设历程的文字与图片，再现了当年秦岭之巅劳动的火热场景。

走出陈列馆，已是下午时间。冬日里碧空如洗，抬眼望，远处的秦岭山峰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依着山势蜿蜒盘旋的铁路尽收眼底，秦岭的壮美与筑路者的英雄精神，在此刻交相辉映，成为永久的见证。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为了适应革命、建设、改革的需要培养人才，党在各个领域创办了多所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红色学校。而在众多学校中，有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这所学校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亲自为之确定办学方针、七次到访学校、三次作报告，并亲笔题词。这所被誉为“马上学校”“红色医生的摇篮”的学校，一直镌刻在党创办学校的光辉历史中。

战时苏区的办学需求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创办于中央苏区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多次“围剿”，以及赣南、闽西地区地处偏远、医疗卫生条件差、各种瘟疫疾病肆虐等原因，红军战士受伤生病较多。而苏区医护人员严重缺乏，使得很多伤病员因得不到有效治疗导致伤残或死亡。因此，培养红军医护人员就成为苏区的当务之急。

1931年初，受党的委派，拥有丰富从医经验的贺诚到达中央苏区。他在了解红军战士伤病缺乏护理救治情况后，产生了创办军医学校的想法。1931年，中国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内外斗争形势有所缓和。1931年11月7日—20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在这次大会之后，贺诚负责的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向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并得到批准。1931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以下简称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1932年2月22日，军医学校在江西于都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出席了开学典礼。朱德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贺诚宣布了毛泽东为军医学校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带着党和红军领导人的谆谆嘱托，以贺诚为校长的军医学校就此正式开学。

因时制宜的办学理念

贺诚在向毛泽东提议办学时，毛泽东叮嘱道：“不要培养成白色医生”“业务技术不可不学，但是不能放松政治思想教育，我们要培养红色医生。”这为军医学校明确了办学的政治要求。因此，建校伊始，军医学校就在教员聘请、学员招收中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招录第一期学员时，红军各部队共选派200多人，有战士、通信兵、支部书记等各类人员。尽管医护人员非常缺乏，但军医学校仍坚持严格选拔，采取文化考试的方式择优录取了25名学员，只占选送人数的八分之一。1933年1月14日的《红色中华》曾载文《军医学校扩大情形》，其中写道：“军医学校的当前任务，应积极创造无产阶级医务人才，以担负救护红色英勇伤病战士之使命。”可见军医学校对于医护人员培养的首先要求就是政治过硬。在办学过程中，政治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课程。

办学伊始，军医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教学设备极为短缺，但军医学校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使其有序运行。没有黑板，师生们就用墨汁涂成黑板；没有桌椅，师生们就用砖头石块砌成桌椅；有木匠手艺的学员则自己动手修理门窗、打造教学用具。上课用的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讲义则由学员自己刻板油印。军医学校本身具备的“教学硬件”仅仅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这些简陋的设备当遇到敌情时，仅用一匹马就可以全部运走，因此当时的军医学校也就有了“马上学校”的称谓。

为适应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形势需要，军医学校的课程少而精，重点突出。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有“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等，外伤处理及疟疾等易发疾病的治疗也是其中的教学重点。此外，坚持“教学一致，学用一致”的教学原则，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简而易有效。如学校教员将难以理解的医学知识点编成歌曲，方便学员熟记。曾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的涂通今曾赋诗高度评价学校：“中央苏区无医堂，创办卫校好主张。采取实用短训法，‘红色医生’美名扬。”

1933年4月，第一期学员顺利毕业后随即奔赴前线，不少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曾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范同麟，在梅岭被俘后，牺牲在敌人的监狱里；曾任红军第十军团卫生部部长胡云庚，在赣东北被俘后，在雨花台慷慨就义；曾任红一师卫生队长的石大祥，长征到陕北后在战斗



中牺牲……他们用鲜血诠释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

赓续发展的红色学校

1932年10月，军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以下简称卫生学校）。卫生学校在办学经验、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有所提升，学校逐步拥有了图书馆、解剖室、消毒室、标本室、外科手术室等，各类相关的教科书和医疗模型也达到几百种。从1932年军医学校办学，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共毕业五批学员，培养了数百名军医、卫生员、护士等医护人员。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此时卫生学校在精简人员机构后，也随同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长征过程中，卫生学校培养出的医护人员用他们的医术挽救了很多红军将士的生命。它也成为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卫生学校第六期学员在长征中继续学习，并于1936年顺利毕业。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卫生学校在瓦窑堡复校开课。1940年9月，在毛泽东提议下，卫生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医科大学）。在延安，医科大学规模逐渐扩大，教学工作也走上正轨，为边区培养了许多医务人员。毛泽东始终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多次到医科大学视察，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1941年，他为学校第十四期学员（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老红军许德在《红军卫生学校的回忆》中写道：“学校之所以办得好，因为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师生们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下定为革命献身的决心。有了这个条件，一切也就都有了。”

带着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医科大学的学子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优良革命作风，为革命胜利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医科大学的莘莘学子更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党在中央苏区创建的这所军医学校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坚持人民至上，救死扶伤。红色医生的传奇故事将被永远铭记，他们的革命精神也将一直激励着人们努力奋斗、为国奉献！

